



QIAN FAN SHI XUE

千帆诗学

程千帆

CHENG QIAN FAN



QIAN FAN SHI XUE

千帆诗学

程千帆

CHEUNG QIAN F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帆诗学 / 程千帆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8

(北斗丛书)

ISBN 978-7-5399-3780-9

I. ①千… II. ①程…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0164 号

书 名 千帆诗学

著 者 程千帆

责任编辑 刘 霖

责任校对 龚芝萍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5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80-9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程千帆先生小照，1998年摄于家中。

目 次

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

——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1)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34)	
附: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 论会上的发言	(58)
读诗举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	(61)
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 研究	(76)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95)
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	(118)
左太冲《咏史》诗三论	(138)
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	(146)
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	(153)
唐诗的历程——《唐诗鉴赏辞典》序言	(156)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163)
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	(180)
李颀《杂兴》诗说	(193)
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	(203)
附一:《复堂词序》试释——清人词论小记之一	(217)

附二：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清人词论小记之二	(223)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	(228)
韩愈以文为诗说	(244)
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	(269)
读《宋诗精华录》	(275)
宋诗的特色——《宋诗精选》前言	(281)
读《倾盖集》所见	(285)
答人间治诗	(292)
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	(295)
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	(303)
编后记	(313)

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

——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巩本栋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程千帆先生主要是以其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而确立其地位的。翻开皇皇十五卷、凡数百万言的《程千帆全集》,人们往往会惊异于程先生研究视野的开阔、思力的敏锐、识见的精到、角度的新颖和学养的渊深等等,这些当然都不免令人钦仰,然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就中所体现的程先生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尤其是他明确提出并成功地运用到其研究实践当中的,将文艺学与文献学尽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对学术事业的发展,也许具有更大的启发性和长久的生命力。本文即试图通过对程先生一生学术取向的追寻及其学术成就的探索,以展示他在研究中所建立和运用的上述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渊源与背景、内涵与演变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等,希望能有助于人们对程先生思想学术的全面了解。^①

^① 关于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方法,周师勋初《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载其所著《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舒芜先生《千帆诗学一斑》(载《读书》1991年第6期)、莫砺锋《程千帆评传》(载《学术界》2000年第4期)、蒋寅《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载其所著《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张伯伟《程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附载于程先生《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均有精到论述,且与本文所取角度有所不同,请参。

—

程千帆先生的一生是十分坎坷的。先生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程先生曾用过的诸多笔名之一，后通用此名。其祖籍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今改属望城县），自上代迁居长沙，1913年9月21日生于长沙清福巷程宅。程先生家境清贫，但数代以来就有文学传统，他童年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随其伯父君硕先生（名士经，号苞轩，有《曼殊沙馆初集》）读书的。1928年秋，程先生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中学初中三年级插班学习，四年后入读金陵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程先生大学毕业后，工作单位屡经变迁，四十年代初，曾先后任教于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武汉大学中文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十八年工作的权利，直到1975年才摘掉帽子，而得到彻底改正，又是几年后的事了。1978年夏，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聘请程先生为南大中文系教授，由此程先生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直到2000年6月3日他不幸去世。

程先生思想学术的背景和渊源，可以追溯到湖湘学派。湖湘学派自南宋胡宏开其端，张栻奠定规模。朱熹曾称之为：“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纯粹、志趣确实者。”^①其后湖湘虽长期文教不盛，然朱、张以理为本，涵养、躬行兼重之风，不绝如缕，至晚清遂不仅先后崛起一大批军政之绩显赫、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更涌现了魏源、郭嵩焘、王闿运、杨度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并养成通经致用、政学相贯和道德与治术相结合的湖湘

^①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曹晋叔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学术精神。^① 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字子大,号十发居士、石巢居士、鹿川田父,有《十发居士全集》),曾参谭继洵、张之洞幕府,后为岳麓书院山长、武昌自强学堂监督。程先生自少年时即随十发老人的长子君硕先生学习,当时,除了学习许多传统的儒家典籍和文史著作之外,亦读过《曾文正公家训》等乡先贤的著作。耳濡目染,受到一定的熏陶。后改入南京金陵中学读书,听黄云眉先生讲授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实则以此为纲,讲授国学概论),不仅为其迥异于私塾教育的宏观论述的方式所震动,且于湖湘学术本身也自当更有会心。程先生一生虽以治中国古代文学为主,虽并不反对所谓为学术的学术,然又总是“特别强调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志要重视现当代文学”,认为“关心现代当代文学,就是关心人民。因为它提出了有关人民命运的问题。如果文学创作不能回答人民生活当中的问题,那要文学干什么?而古代文学之所以值得我们今天这样尊重,除了它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以外,正因为它们关心人民生活,提出或者回答了人民在生活当中提出的问题”。^② 这种对学术关注现实的提倡,与湖湘学术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程先生的学术思想还曾直接受到王闿运的影响。程先生的父亲穆庵先生(名康,有《顾庐诗钞》)是王闿运的再传弟子(穆庵先生师成都著名书家和诗人顾印伯,而王闿运主尊经书院时,顾为其高第弟子)。王闿运任国史馆馆长,时在天津的穆庵先生曾前往谒见求教。故程先生不但熟谙这位湖湘先贤的轶闻逸事并撰为文章(如《王闿运与袁世凯》等),而且其论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王氏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如王闿运论诗标举汉魏六朝诗歌,而程先生编《古诗今选》,所选诗歌也自汉魏始。又,程先生论诗每好引《湘绮楼说诗》、

^① 关于此点,杨念群先生《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 1997 年版)有详细论述,请参。

^② 程千帆《关于治学方法》,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又收入《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巩本栋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湘绮楼日记》和《王志》等，也透露出个中消息。吴白匋先生《寄千帆》诗有曰：“湘绮高文一脉传，襟怀鸾翮欲翔烟。”^①当并非虚誉。

程先生又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在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上，更是自幼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程先生的曾祖父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于光绪间与曾广钧、易顺鼎齐名，称“湖南三诗人”；父亲穆庵先生则专攻宋诗，尤精后山。程先生幼禀庭训，少年即通声律，被十发老人称之为“诗笔清丽，自由天授”，其外祖父车伯夔（名赓）先生也认为他“有芊眠之思，可与学诗”，^②而在君硕先生办的私塾中读书时，君硕先生强调知能并重，一方面让学生认真地通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资治通鉴》、《日知录》等许多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又很重视诗文写作方面的训练，每天写日记，每周作文，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读书心得。这种浓厚的诗学氛围和严格的读写训练，为程先生打下了很好的传统学术的根基，也对他后来致力于诗学以及形成其独特的诗学思想，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程先生始终认为，文学事业应当知能并重。“诗来自感。作诗，必须对外物有其独特的感发；评诗，也要对作品有其独特的感受。单靠理性思维，不但无法作诗，也难以对诗有真知灼见。”（《闲堂自述》）因此在他多年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停止过诗歌的创作。他在读大学时，即与汪铭竹、常任侠、孙望等组织过“土星笔会”，办过《诗帆》杂志。四十年代起，以教授古典文学为业，仍坚持诗歌创作，只是由于十年浩劫，诗稿大半丢失，今仅存二百多首，编为《闲堂诗存》一卷。程先生之所以能在诗学研究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上述知能并重、感性与理性并重的诗学思想

① 《吴白匋诗词集·热云韵语》卷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程千帆《闲堂自述》，原载《文献》1991年第2期，又收入《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和观点分不开的，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和观点的形成，若论其成因，则又无不与他自幼所受到的诗学熏陶密切相关。

除了家学渊源外，程先生在金陵中学和金陵大学求学期间，还接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像哲学、逻辑学、中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律学等课程，他都曾认真地学习过；新诗和白话文的写作，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三十年代的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程先生遂得以受业其门下，亲承音旨，转益多师。据程先生后来回忆，他曾经“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果（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又“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① 这些广泛而又深入的学习，不仅使程先生的朴学根基愈益坚实，而且也使他对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的认识不断加深，尤其是黄季刚先生讲《文选》与《文心雕龙》，强调必须将二者合观，才能得见当日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实；胡小石先生讲文学史，非常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和会心，都对程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②

其他像虽不曾做过程先生的老师但先生后来始终以师礼事之的刘永济先生，论学也兼重理论和创作，对程先生有积极的影响。刘先生早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即与十发老人有过来往，程先生后来到武大任教，又是刘先生介绍的，所以，刘先生与程家也是世交了。直到程先生晚年，每言及刘先生，语极推崇，

① 《闲堂自述》。

② 关于这方面，张伯伟在《程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一文中有关较详细的讨论，请参。

自谓“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①并撰《刘永济先生传略》，对刘先生的学术成就评价很高。刘永济先生属“学衡派”，但又并不拒绝接受新的理论和观念。他曾撰《文学论》，以中国传统文论为素材，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试图构建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体系，是我国较早的文艺学著作之一。其四十年代所撰《文心雕龙校释》，既长于持论，又附录《文心雕龙征引文录》三卷，前两卷为文录（即作品选），末卷为参考文目录（即文论选）。^②这些观点和看法，与程先生古今中西结合、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创作相结合的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再像以诗人、散文家兼为学者的朱自清先生，也主张文学研究应当考据与批评相联系。朱先生在他的名作《诗言志辨》的序里就说：“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③朱先生所谈的虽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然观点很明确，即主张考据的目的应是“阐明批评的价值”。四十年代初，程先生在四川时与朱自清先生曾有过交往，程先生当时所撰的一些文章，也曾呈朱自清先生指教，并得到朱先生的称赏和“不断地鼓励”（沈祖棻先生语，参《古典诗歌论丛后记》）。这些，对程先生坚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① 蒋寅《立雪私记》，见《学术的年轮》第21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关于刘永济先生对程先生的影响，我们实可从程先生所撰《刘永济先生传略》（载《闲堂文薮》，齐鲁书社1984年版）见出。蒋寅《程千帆教授学术之品格》（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修改后又收入《学术的年轮》）亦论及，蒋寅与周师勋初同样，又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学风对程先生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张伯伟在《程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一文中也论及刘先生的影响，读者可以参考。

③ 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二

深厚的家学渊源和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师承关系等等，无疑是奠定程先生学术成就和影响其学术思想的重要因素，然仅此当然还不够。我们曾仔细地寻绎程先生一生走过的学术道路，深感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具有一种不倦的追求，始终具有一种对理论和方法的敏锐和自觉，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与他的朴学根柢和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学习等因素结合起来，使他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并最终走上了自己学术发展的巅峰。

四十年代初，程先生在四川乐山、成都等地的诸大学中执教时，曾给当时西南联大的《国文月刊》写过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 1954 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程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合撰的论文集《古典诗歌论丛》中。^① 在该书中，程先生已开始尝试将传统的学术方法与现代的科学知识等结合起来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们看沈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一段话：

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有些人对作家生平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释是曾经引经据典，以全力来搜集史料，作了

^① 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后亦收入《古诗考索》（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却没有能够根据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走进作家们精神活动的领域，揭露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的灵魂。另外一些人，曾经反复地欣赏、玩索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发散着光和热的作品，被它们所吸引，因而能够直觉地体会到作家们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些东西，但因为仅仅是从直觉中获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对于其中的“妙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或者虽然说出了所以然，但又没有证据，不足以服人。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无疑地，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例如：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因而它的著者刘勰，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但由于他的许多结论，都是认真地研究了丰富的一手材料才作出来的，这部书中就在许多地方显示了、流露了它的自发的唯物论观点。

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我们就尝试着利用当时自己所能占有的一些知识来进行对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读者们不难看出，我们不仅希望从文学、史学方面获得立论的根据，而且有时还更广泛地利用了其他科学来解决一些通过这些科学可以获得解决的问题。

既勇于接受新的文学批评观念和现代的科学知识，又并非以之取代旧方法，并非要以取消传统文学研究的个性为代价，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尤其是程先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而他在这里所提出的“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方法，于是也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

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考据是批评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又要为批评服务,不脱离批评,不脱离作品,二者密切结合,从而使研究所得的结论坚实可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纯粹的考据就不重要)。比如,陶渊明的名篇《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中“悠然见南山”一句中的“见”字,“此中有真意”一句中的“中”字,又作“望”与“还”等,宋本陶集已是如此。若仅从版本上考察,殊难定其是非。而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则撰为《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一文,明确提出应把版本考校与对作品义旨的理解结合起来,并通过对陶诗中所表现的“物我两忘之境界、其心灵之发展、文章之组织”的分析,判定此二字当以“见”与“中”为是,便很有说服力。再如,同样是陶渊明的名篇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其首句“少无适俗韵”,“韵”字何义,似可有多种解释。程先生在对晋宋语言尤其是《世说新语》中“韵”字的涵义和用例作了大量考察之后,认为在风度、思理、气质、性情等诸义之中,当以“性情”一义与陶诗最切近;而此诗第二句“性本爱丘山”中,既然又要用“性”字,所以陶渊明才为了避复求新,选取了“韵”字,虽然就总体上来看,陶诗本身往往是真淳自然,并不在字句上刻意求工的(《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由于程先生能将考据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所以,有时他似乎是在做纯考据学的工作,但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却仍属文学范畴。比如他的《诗词代语缘起说》一文,将自来诗词代语的用例归纳排比,按其辞与义,分为“除复重,矫熟俗,资偶丽,调声律,齐句度,别善恶,避忌讳,远嫌疑,明分际”等九类,以说明中国古代诗词创作中修辞手法产生的原因及其运用,帮助人们更好地解读古典诗词。其所运用的方法虽是朴学方法,而所要解决的却是文学创作和接受上的理论问题。

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

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文学批评的结论,应当来自通过史学实证所得到的材料之中,而不是纯主观的判断或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例如,王维的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清人沈德潜评之为“反复曲折,使落第人决无怨尤”。^①然这样一个结论,即此诗究竟怎样“反复曲折”,又何以能“使落第人决无怨尤”,却是只有对唐代的进士科举制度有所了解之后才能明白的。程先生在《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跋》一文中,对唐代进士考试的贵重,登第的艰难,竞争的激烈,以及每岁登第的人数、试期、应试者的生活等有关的风俗制度,详加考辨,并由此推断綦毋潜所应为何试、应试时间、是否初次应试等具体细节,分析王维此诗于时于事两相开释,于己于人珍重惜别与慰藉希望等多种情感表达的错综交织与委婉曲折,遂能深入腠理,使读者对王维诗的义蕴有了较为真切的感知。再如,左思《咏史》诗八首,旨在咏怀,人所皆知。然程先生却并不满足于这一认识。他将史学考辨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取晋武帝《伐吴诏》及《晋书》等与左思《咏史》诗对勘,确定其诗之作必在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诏书初颁稍后,进而指出这八首诗实为一个整体,诗中所咏,虽杂陈前代史实,不专一事一人,但其所借以表达的思想情感,却是或引为譬况,或引为仰慕,或引为慰藉,或引为鉴戒,有一个“由积极而消极、由希冀而幻灭之过程”。而其借咏史以抒怀的艺术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孔融的《杂诗》。这种建立在史实考辨基础上的分析论述,具体细致,令人信服。其他如比较郭璞与曹唐虽同以《游仙诗》而称名于文学史,但二者生平行事、创作背景、艺术渊源等俱各不同,故其义旨也不相同,也是将史学的考证与文学的批评紧密结合的佳例(《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

^① 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程先生所说的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除了上面所说的两层含义之外，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他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程先生的《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和《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两篇文章。《李花赠张十一署》和《南山》诗，都是韩愈的名篇，前者描写暗夜之中的李花，有曰：“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唯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体物既精，状物尤美。其中“花不见桃唯见李”一句，不仅为后来许多著名诗人如李商隐、郑谷等在创作中一再袭用，而且也得到王安石、苏轼、陆游、杨万里、周紫芝等人的一致称赏，然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道出此句奥妙之所在的，则仍不能不推程先生此文为较早。^①他从物理学的原理出发，指出物体的色彩如赤橙黄绿等所以各不相同，完全取决于其对光线反射的程度如何。若光线全部被所照射的物体所反射，则此物体在人的视觉中即呈白色，若部分被反射，则呈现出其他各种不同的色彩。白昼光线强，物体无论反射强弱，人们都很容易辨别其色彩，而到了夜晚，光源主要来自月亮，当时至月底，不见月亮，光线很弱时，“红色反光不强，即不可见；视觉所及，但有光存，故唯见白李，不见红桃。此诗所赋，时当月尾，是以云‘花不见桃唯见李’也。”同样，韩愈在《南山》诗中写到的“时天晦大雪，泪目苦朦胧”两句，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解释。雪后初晴，漫山皆白，泪目朦胧，正是由于雪地的反光强烈所造成的。这种将科学的知识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说诗的方法，使人既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读之确是耳目一新。

考据之外兼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批评之中又始终不

^① 近人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石遗室诗话》及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论及韩愈此诗，语亦精到，然尚未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此诗。